

四川历史丛书

四川简史

「四川简史」编写组

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

《四川历史丛书》

四川简史

《四川简史》编写组 编著

主 编 陈世松

副主编 贾大泉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一九八六·十二·成都

责任编辑：张 力

吴康零

彭朝贵

封面设计：张复祥

四 川 简 史

《四川简史》编写组

主编：陈世松 副主编：贾大泉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市书林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 字数：276千

1986年12月第1版 成都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书号：11316 60

定价：1.95元

《四川历史丛书》

出版说明

天府之国的四川，人杰地灵。四川历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川各族人民在创造祖国历史的过程中，谱写了壮丽多彩的篇章，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在继往开来的新的历史时期，全面系统地研究四川历史，出版一套学术价值较高的《四川历史丛书》，是四川史学工作者和出版者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

这套丛书，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再现四川从古至今社会发展的概貌，探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整理、保存璀璨的文化遗产，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四川提供历史借鉴，为进行爱祖国、爱家乡教育提供乡土教材，同时也为编撰国史提供有关四川的翔实史料。

这套丛书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多卷本的四川断代史，二是有关四川历史的专题研究著作。这套丛书将在近年内陆续出版。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点错误难免，祈请史学界、出版界的同行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四川历史丛书》编辑组



↑
〔新石器时期〕彩陶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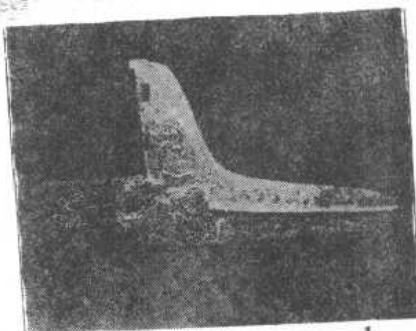
〔战国〕铜尊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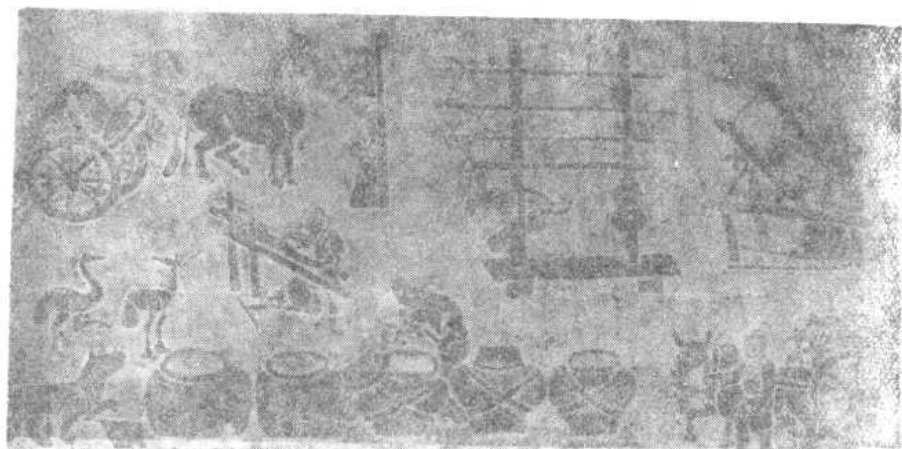
→
〔战国〕漆盒



→
〔战国〕铜戈



↑ 〔新石器时期〕彩陶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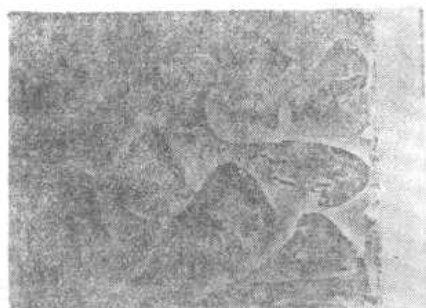


↑ 【东汉】 石刻画像“织机酿造图”（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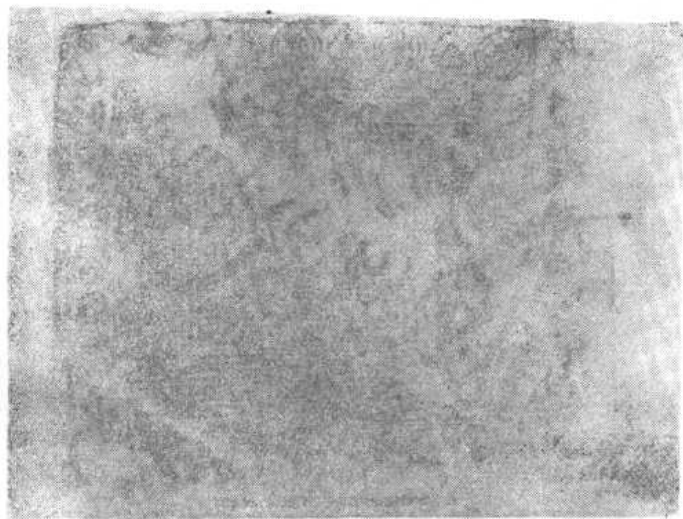
↑ 【东汉】
说唱陶俑

【东汉】盐井画像砖→



【南北朝】
石刻造像→





←
〔唐代〕陀罗尼经咒雕版黄纸印本



←
孟知祥墓内壁画之一



←
孟知祥墓内壁画之二

〔五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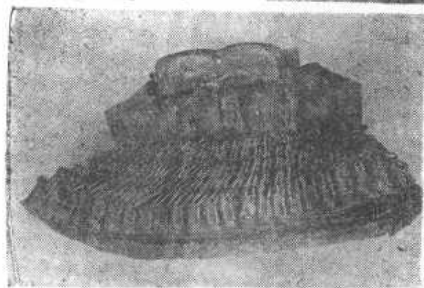
一
〔五代〕王建墓之王建造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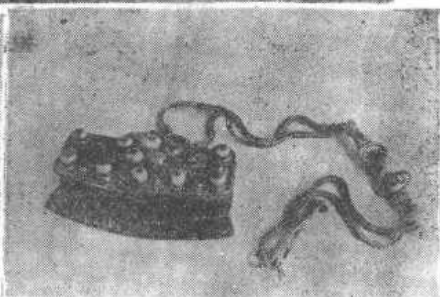


〔宋代〕大足石刻养鸡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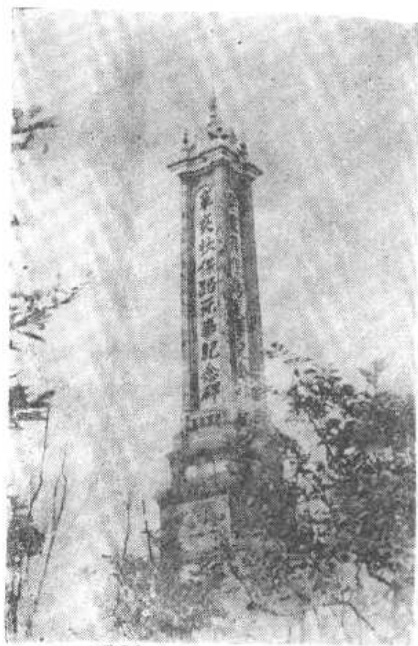
〔元代〕
牵马俑



〔明代〕彝族铠



〔清代〕藏族打火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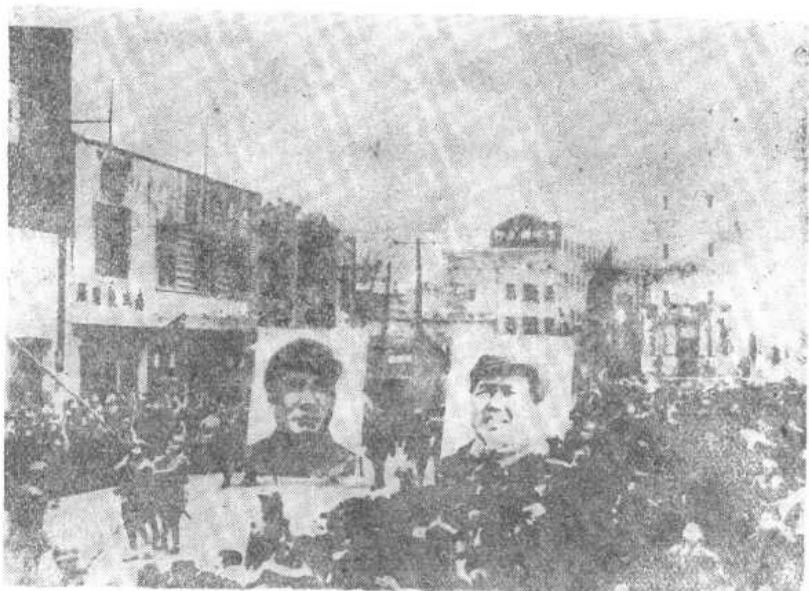
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成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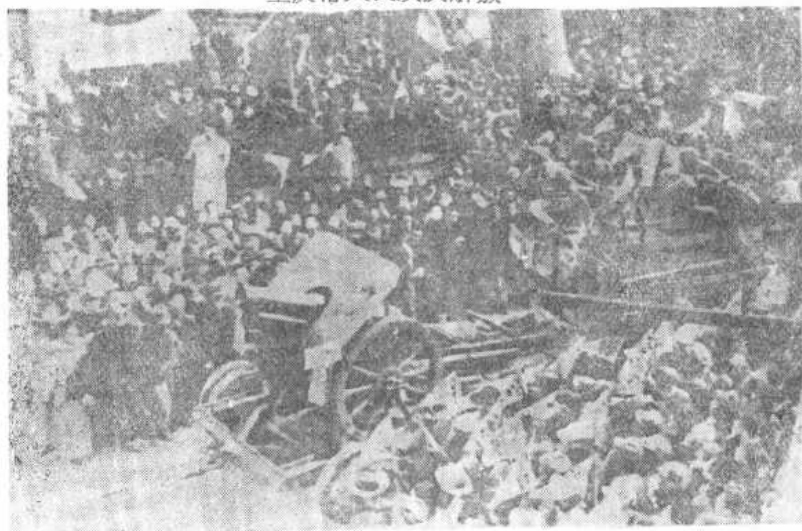
抗日战争无名英雄纪念像(成都)



重庆红岩村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



重庆市人民欢庆解放



成都市人民欢迎解放军入城

(以上图片除最后三幅由重庆市博物馆供稿外,其余均由四川省博物馆供稿)

前 言

四川素称“天府之国”，是一个由多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众多人口、辽阔土地和丰富资源的省区。

四川历史悠久，是我国古代文化发生发展的最早地区之一。远在若干万年以前，即有人类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繁殖。在距今三千多年前的殷、周时代，就开始出现了巴、蜀奴隶制王国。从公元前三一六年秦灭巴蜀开始，四川地区进入封建社会，历经了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四川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川获得解放，这一地区的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

《四川简史》是从远古到四川解放（1949年）这一历史阶段内四川地区的一部通史。它所叙述的只是这个历史阶段中我国历史在四川地区的部分内容。由于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文明古国，各地区的自然条件、经济、政治情况不同，发展很不平衡，因而表现在历史、文化、风俗、习惯方面也有极大的差异。这就决定了这一阶段历史在四川地区有着特殊的表现形式，由此使得这一阶段的四川历史不能不带上浓郁的地方特色。

四川地方史研究的任务，就在于从四川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立足四川，放眼全国，既注重全国历史的共性，尤其要研究它的个性，努力通过揭示它的鲜明个性来表现全国历史的共性。为此，我们必须在研究中充分阐明四川历史的特点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关于四川历史的特点、地位和作用问题，我们仅仅在初步探讨之中，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认识：

一、在四川历史发展过程中，特殊的自然条件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作用。这种特殊的自然条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被群山环绕的四川盆地，以及优越的地力、良好的气候条件；二是四川战略地位重要，天然形胜，陆有剑门之障，水有三峡之险；东扼长江，足为吴楚咽喉；北走秦岭，沟通秦陇肘腋；西南为高原环绕，为滇藏必经之道。由这些特殊的自然条件，很容易派生出地理上的封闭性、战略上的策应性、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性和政治上的割据性等等。四川历史上若干特殊、复杂、纷繁的场面，往往正是由这些因素交相影响而形成的。

二、在经济上，由于四川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斗争实践中，充分利用四川盆地优越的自然条件，发展农业，并注意克服水害和交通不便所带来的困难，因而使这一地区在古代较早得到开发。早在秦汉时代，这里就已经成为“沃野千里”，物产丰富，经济繁荣的“天府之国”。当时四川的经济实力已超过关中，跃居经济最早繁荣的“三河”地区（即河东、河内、河南）之上。原来最为先进的关中地区，这时只够配称“近蜀”，“与蜀相类”而已。立足于这样的经济基础之上，刘备进取巴蜀，终成三足鼎立之势。四川经济的持续发展，至唐中叶“安史之乱”之后，北方经济重心南移，四川安定繁荣，盛极一时，出现了“扬一益二”的局面。所以，自唐玄宗入蜀以来，衣冠大族，多来四川避难。至宋代，四川农业“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粮食自给有余，手工业高度发展，经济实力日益雄厚，南宋时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军费供自四川。四川古代经济的发展，不仅在中国政治经济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某些成就还具有世界意义。如二千多年前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至今还发挥着巨大的经济效益，便被视为世界最完备的水利工程，堪称水利工程上的一大奇

观。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首先在宋代四川出现，这也与当时四川经济的高度发展密切相关。

三、由于这一地区能在经济上保持自给自足，在地理环境上可以凭险拒守，又能构成高屋建瓴，席卷东南之势，所以四川足以在政治上成为“王业之基”和长期抗衡之地，同时还可作为称雄割据者安身立命之所。

一种情况是，自古以来取中原者必资以蜀，多依赖四川的经济军事实力以夺取天下。明末清初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輿纪要》中论述最为精辟。他列举史实说：“是故从来有取天下之略者，莫不切切于用蜀。秦欲兼诸侯，则先并蜀，并蜀而秦益强，富厚轻诸侯。晋欲灭吴，则先举蜀，举蜀而王濬楼舡自益州下矣。桓温、刘裕有问中原之志，则先从事于蜀。苻坚有图晋之心，则亦兼梁益矣。宇文泰先取蜀，遂灭梁。隋人席巴蜀之资，为平陈之本。……唐平萧铣，军下信州。后唐庄宗灭梁之后先吞蜀，未可谓平削平南服之雄心也。宋先灭蜀，然后并江南，收交广”。

另一种情况是，每当中原动荡，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地区遭到破坏时，据地自雄者很容易利用四川远离朝廷的地理环境，凭险拒守，以成“偏安之局”。这是四川这块土地上易于孳生割据政权的重要原因。章太炎曾经概括这一历史现象说：“四川重江复关，自为区域，先后割据者七矣。公孙述、刘备、李特、王建、孟知祥、明玉珍、张献忠皆自外来，而乡土无作者”。其实，这里所列的七个政权，仅仅是割据有年的偏安政权。至于在这块土地上企图称雄自立，终未形成气候，或者历时短暂而告失败者，还有若干起。上述七个偏安四川的割据政权的形成，都同当时封建王朝国势衰微，中原板荡的局面密切相关，并非和蜀人有必然的联系。正如宋初蜀人张唐英在《蜀梼杌》中所说的：“朝廷治则蜀不能乱，朝廷不治则不惟蜀不顺，其四方藩镇之不顺，亦有不亚于蜀者”。

再一种情况是，当中国政治中心沦丧时，这一地区往往成为坚持最后抵抗的基地。这种情况，在蒙古和清朝入主中原时，表现最为明显。当一二七六年南宋临安政权灭亡时，四川仍在为宋坚守，直至南宋流亡政府于一二七九年在崖山覆灭前夕，四川才最后归附元朝。清军早在一六四四年就入主北京，但是直至二十多年后，四川才最后结束抵抗。至于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南京沦陷，武汉失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四川又成为全国抗日的大后方和根据地，这更是四川政治地位重要性的体现。

中国过去有句谚语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这里的“治”“乱”观念模糊，也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大可不必以此评述四川历史。但借用这句谚语说明四川政治地位的重要性，即四川的安危对全国的政局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则无疑是适当的。

四、植根于上述地理、经济、政治之中，这一地区创造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巴蜀文化。根据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古代巴蜀遗址发掘表明，早在殷周时代，巴蜀文化就属于一种既与中原文化有某些联系，而又与之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以古代巴蜀的天文学为例，中原以“东、南、西、北”的顺序排列四方，而巴蜀则是以“南、西、北、东”表示；中原计数以万万为亿，而巴蜀则以十万为亿。这表明巴蜀天文学是属于南方系统的，而与中原系统有所区别。这一独特的文化体系发展至西汉，显示出鲜明的特征，放射出夺目的异彩。这时，四川文化以其天文、历算、文学的特长居于全国之首。文学上有扬雄、司马相如、王褒、天文历算上有落下闳、任文公。在经学方面，自文翁提倡办学传授经学以来，四川尤以演《易》成就最高，代表人物有扬雄、严君平。四川学术文化在这一时代赢得了“天数在蜀”，“易在蜀也”的赞誉。其后，汉晋间，四川地方史志学大为兴盛，名列全国前茅。自唐代中叶以后，中原文化大量传入巴蜀，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

交相融合，在五代时创造出了前后蜀文学艺术的灿烂成就。宋代是四川文化繁荣兴盛的时期，文人荟萃，学术发达，史家林立，著述甚丰，堪称全国之冠。时有两宋“人文之盛，莫盛于蜀”的美称，足以显示其在全国的地位。至于大足石刻艺术的完美精湛，更成为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它是在我国北方石窟艺术低落之后，在我国南方兴起的一颗石窟艺术明珠。元、明、清各代四川文化，虽没有出现如此壮观的局面，但在某些领域也不乏取得突出成就的代表人物。

五、四川是我国一个多民族的省区，由于它位居西北与西南的枢纽之地，是历史上民族迁徙的必经“走廊”，因而在历史上各民族的融合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远古时代这一地区就有众多的民族生息、繁衍。在秦汉时期，巴蜀西面和南面的少数民族被统称为“西南夷”。自汉武帝开“西南夷”以来，这些地区开始设置郡县，进一步加强了中央王朝和四川各少数民族的联系。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四川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代。当时，南来北往的少数民族都以四川为活动舞台，居住在西北地区的氐人和各族流民数万家迁徙入蜀，建立了成汉政权；从贵州方向进入四川的十余万僚人，遍布全川，所在皆有；西北地区的氐、羌、胡等少数民族也先后进入川西高原，长江沿线的僰人则一直进入成都。这些迁入四川的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中，逐渐互相融合，或重新组合，形成了一些新的民族。其中还有许多民族最终与汉族相融合。经过这一大融合的时代，在川西南地区出现了以“乌蛮”、“白蛮”为主的少数民族部落，川西高原上则以羌人部落的分布最为广泛。唐宋时期，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羁縻府、州制，元明时推行土司制，广泛任用各族上层人物充当土官。至清雍正开始改土归流。在这一系列斗争过程中，凡有少数民族内犯，都首先进攻四川地区，而中央王朝治理少数民族的官员也都驻守四川，因此，在处理少数民族关系上，四川地区也

占有重要的位置。

六、四川人民自来有为理想献身的斗争气概。远的略而不论，在近代，戊戌变法六君子之列的富顺刘光第、绵竹杨锐，辛亥革命中的四川三大将军：邹容、喻培伦、彭家珍，或从容就义，或杀身成仁，不愧是近代中国革命的先驱。辛亥革命，首先发难在四川，成都人民公园保路死事纪念碑，巍然留芳于后世。五四运动时期留法勤工俭学，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和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四川学生人数较多，许多都成为革命骨干。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四川人民不屈服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奋起反抗，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在四川各地燃起了武装起义的熊熊烈火。在抗日战争时期，无数四川儿女为保疆卫国，抗击日寇的侵略而献身沙场。在解放战争时期，四川人民为推翻蒋家王朝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四川这块富有革命传统的土地上，孕育了无数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四川人民至今仍以爱社会主义、爱整个国家民族也爱自己乡土的心情，深深怀念“创业艰难百战多”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朱德、陈毅、刘伯承、罗瑞卿以及吴玉章、郭沫若、王维舟，深深悼念为革命英勇牺牲的赵世炎、孙炳文、刘伯坚、卢德铭、赵一曼、王右木、杨闇公、穆青、李鸣珂、袁诗尧、罗世文、车耀先、杨伯凯、江竹筠等烈士。

编写《四川简史》，是一项义不容辞的重要任务。直至今日为止，国内还没有一部系统完整叙述四川古今历史的著作问世。解放前出版的几种四川历史著作，如任乃强的《乡土史讲义》（1927年南充印行）、柳定生的《四川史话》（南京钟山书局1940年版）、郑德坤的《四川古代文化史》（华西大学1946年版）、吴致华的《四川古代史》（成都普益社1948年版）等等，已不能适应当前的需要了。当前，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中，人们迫切需要了解四川过

去的历史，以便从中掌握省情，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同时，对广大群众，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爱祖国、爱家乡的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编写四川历史作为乡土教材也是十分必要的。为此，我们决定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著这本《四川简史》。由于本书主要是为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干部职工和青年编写的，书稿中尽量避免过多的征引，除必要的原始材料注明出处外，对一般性成果的出处便未一一标注；另外，限于篇幅，本书对许多问题也未及深入展开。这些都是这个简明四川历史读本的性质决定的，想必能为读者所理解。

在编写这本《四川简史》的过程中，我们力图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述四川历史发展的线索和脉络，突出四川历史的特点、地位和作用。但是，由于我们的功力不够，研究不深，特别是还有很多领域有待开拓，目前尚无更多的成果可供借鉴，在这种情况下，书稿必然难以如愿。不过，我们愿意借本书公开出版之机，广泛征求专家和读者的意见，以便在大家的批评指正中得到提高和改进。抛砖引玉，至所期盼。如能在本书之后，引出更多更好的四川历史著作问世，以促进四川地方史学的繁荣和发展，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